

营盘山遗址——藏彝走廊史前区域文化中心

2005-5-23 陈剑 陈学志 范永刚 蔡清 阅读438次

中国西南横断山区不仅以其高山峡谷相间这一独有的地势特征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连接黄河及长江的重要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民族学上称其为藏彝走廊或氏羌走廊，岷江上游是组成该走廊的核心地区之一，而中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茂县则为这一核心地区的中心。茂县东南距成都约200公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悠久，尤其是县城凤仪镇所在谷地是岷江上游面积最大的一处河谷冲击扇平原，也是岷江上游的地理中心，土肥地美，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一直是人类选择定居地点的理想之所，茂县置县以来的历代治所均设于此，汉代汶山郡治所也一度在此。时至今日，茂县仍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经济重地。因此，县城谷地还是岷江上游的文化、政治和地理中心。2000年以来的考古调查共发现了营盘山、波西、金龟包、波西台地、上南庄、勒石、沙乌都、马良坪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采集点，其中，营盘山遗址的面积最大、发现遗存也最为丰富。

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上，平面约呈梯形，东西宽12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遗址东面临深谷阳午沟，东北面、北面、西面均为岷江所环绕，东距茂县县城约2.5公里，海拔高度1650-1710米，高出岷江河谷约160米，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营盘山遗址东、西、北三面均为陡坡，背靠九顶山，并临近岷江河道，易守难攻，为岷江上游地区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是人类长期定居的理想之所。遗址所在地属于九顶山的山前脊梁地带，但遗址表面地势较为平整，起伏坡度不大，与周围同海拔高度的山脊状地形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其独特的平整地形的成因应与历史上人类的改造活动有关，营盘山遗址的地势现状是经过多个时期的改土活动后才形成的。又根据遗址范围内普遍发现有原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在遗存堆积的厚度上不同部位略有差别），判定这种改土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

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堆积较为丰富，文化层最厚处可达2.20米，其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石棺葬遗存，下层为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遗迹包括房屋基址11座、人祭坑9座、灰坑120余座、窑址4座及灶坑13座等。通过勘探和发掘对遗址的布局分区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其中部地带发现较多的柱洞、基槽等房屋基址和窖穴类遗迹，应为居住区；遗址中部偏西地带发现有大面积的硬土活动面遗迹，地势较为平坦，硬土面下还清理出人祭坑多座，应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公共活动的广场区；广场区以北地带发现有多座窑址和数量丰富的灶坑遗迹，应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另在遗址中部偏北地带发现有多处灰坑遗迹，坑内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叶、细石核、燧石器、燧石原料及半成品，推测此处可能为集中制作细石器的地点。

营盘山遗址主体遗存同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东乡林家遗址主体遗存等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遗存，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文化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相比较，之间存在较多的共性，但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营盘山遗址目前有两个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试的碳14年代测试数据，树轮校正后的年代约为距今5300-4600年，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年代相近。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

在遗址已揭露的遗迹中，其下有奠基人祭坑的大型广场性质遗迹、内有涂红石块的灰坑、内设分间

并建造有考究的灶坑等设施的房屋基址等，非一般小型聚落遗址所能具备。出土文物中也不乏表现营盘山遗址作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高规格实物，如陶质人面像雕塑品、表面凿有多个穿孔应有特殊用途的石牌形器等遗物。而以彩陶制作工艺为代表的制陶业是整个仰韶时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所在，营盘山遗址出土数量众多且制作精美的彩陶器，更是它作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实物标志。遗址出土的玉器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仿生产工具的镞、斧、凿、穿孔刀、镞等，多数的刃部未见使用痕迹；其二是环镯、珠类装饰品；其三是具有礼仪用器性质的璧、璜类器。这表明营盘山先民的玉器加工已成为一门内部有较细程度分工和较高专业化程度的手工业门类，也标志着营盘山遗址在聚落群体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营盘山先民以定居农耕业为主要生活方式，这可以从遗址内发现的相关遗迹和出土遗物中找到证据。例如，出土遗物包括较为丰富的石质、陶质和骨质生产工具；陶器中夹砂厚胎的炊器，器体宽大、容积深广的贮器占有一定的比例。遗址出土陶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酒具类器物，如制作精美的彩陶壶、彩陶瓶、杯、碗等，据此推测营盘山先民可能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并开始进行生产。遗址内还发现有圆形袋状灰坑，应为用于贮藏粮食或其它物品的窖穴。这些发现表明当时农产品的数量已较为丰富。

同时，狩猎、采集和捕捞业也是营盘山先民以农耕业为主业的经济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内容。岷江从营盘山遗址的西、北和东北三面环绕而过，弯曲的河道形成了较大面积的回水湾区，河水流速减缓，其中的浅水区域是理想的捕捞作业场所。遗址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狩猎所用的石球、磨制精细的石质和骨质箭镞等遗物。还出土有数量众多的细石叶、细石核及小石片石器，质地以黑色及白色半透明的燧石、白色的石英和透明的水晶为主，细石器制作工艺成熟，选材精良。学术界一般认为，细石器多为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常用来剥离加工兽皮，细石器工艺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密切联系。遗址还出土有亚腰形的打制石网坠，当为捕捞渔业的实物例证。

营盘山遗址的细石器及小石片石器具有出土地点集中化的特征，未经使用的成品石器、半成品石器和加工残片，多在几处填土呈灰黑色的大型灰坑内出土。此现象表明营盘山先民中已有固定的人员从事石器加工作业，这些大型灰坑可能就是当时的石器加工作坊所在地，而石器（尤其是细石器）制作已成为手工业的专业门类之一。

在营盘山遗址的灰坑底部发现有涂抹红色颜料的石块，经测试其成分以汞的氧化物（朱砂）为主，另在部分陶器内壁也发现有同样的红色颜料，应为调色器的遗存。表明营盘山先民有尚红习俗，朱砂的具体用途可能与涂面、刷牙等活动有关。尚红习俗历史久远，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即已在埋葬死者时使用红色矿石粉，如将矿粉撒于死者周围，并将随葬用的饰物兽牙、石珠、鱼骨都染上红色。新石器时代对死者骨架或石器涂红的现象数量更多，如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有大量的在打制石器上涂抹红颜色的现象，但经测试，它们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赭石），成份以铁的氧化物为主。而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涂红现象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三星堆、金沙遗址均流行在玉器、石雕像上涂抹红色颜料的风格，从这一风格中也许可以找到营盘山遗址的朱砂涂红现象的影响。

营盘山先民具有较为高超的装饰和造型艺术水准，尤其在彩陶器的加工制作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遗址出土彩陶器种类繁多，质地以细泥红陶为主，火候较高，烧制温度可达摄氏1000度，扣之有清脆的响声。器表均打磨光亮，有的还施有一层白色的陶衣，再于其上用软笔绘出各种图案，图案内容题材丰富，包括动物（变体鸟纹、蛙纹等）、植物（草卉纹、草叶纹、杏圆纹等）、几何图形（垂帐纹、水波纹、弧线纹、圆圈纹等）三大类，绘制笔法流畅、娴熟。彩陶器的造型特征以几何曲线形为主，器类有瓶、罐、盆、钵等，不少堪称精品。包括彩陶器在内的部分加工制作精致的泥质陶器，开始逐步脱离日常生活实用器的特征，呈现出礼器化的迹象。

遗址出土多件小型的陶、石质人面雕塑。其中的一件陶质雕塑人面像，鼻及双耳为捏塑，双目及口部刻划而成，造型生动、传神，造型与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较为相似，表明是受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这是目前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雕塑作品，堪称四川雕塑艺术的源头。

人祭制度和猎头习俗也是营盘山先民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遗址中部地带发现了一处面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的类似广场的大型遗迹，坚硬的踩踏层之下发掘出4座人骨坑，其中3座均保存有一具较为完整的人骨架，应是具有奠基性质的人祭坑。另一座仅见一件人头，该头骨已不见颅顶及上颌部分，剩余颅身及下颌部分，这种现象可能与原始社会常见的猎头习俗有关。在遗址中部偏东的房屋密集区附近也发现有5座奠基性质的人祭坑。

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处面积在数千至近万平方米不等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其中的上南庄、勒石、马良坪、金龟包等多数遗址与营盘山遗址的时代相近；而波西、沙乌都等个别遗址的年代略有差异，较营盘山遗址略早或略晚。以营盘山遗址为中心，包括波西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的营盘山大型遗址群，在时间及空间之上均有各种联系，从而组合成较为完备且颇具特色的聚落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群，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可以命名为营盘山遗址群，如此规模的遗址群在长江上游地区极为少见。同时，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营盘山遗址也是藏彝走廊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

营盘山还是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延续时间甚长的石棺葬墓地。根据已发掘单位面积内石棺葬的排列密度推算，营盘山遗址15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的石棺葬总数可达数万座，堪称国内罕见。从本次发掘清理的150余座石棺葬来看，墓葬间不见叠压打破现象，石棺葬底部均未铺设石板，仅使用侧板和盖板，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玉石器等类。墓葬排列整齐，分组明晰，墓葬的形制大小有别，随葬器物多寡不一，一些墓葬盖板上立有底部制作平齐的长条形卵石，个别墓葬附近还设有陪葬的器物坑，二次葬现象常见。这些情况表明墓地经过了统一的规划，其时代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与石棺葬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包括石条砌成的方形火塘、柱洞和基槽等房屋设施等。这批资料无疑为探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陈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一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陈学志，阿坝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副研究员

范永刚，阿坝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

蔡清，茂县羌族博物馆馆长

来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